

文集

中国财税理论与政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文集

本书编委会 主编

民国前期民营银行 运行机制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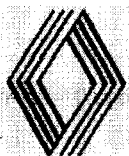
(1912—1937)

MINGUO QIANQI
MINYING YINHANG
YUNXING
JIZHI YANJIU

周春英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税理论与政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文集

本书编委会 主编

**民国前期民营银行
运行机制研究**
(1912—1937)

周春英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前期民营银行运行机制研究: 1912—1937/周春英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10

(中国财税理论与政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文集)

ISBN 7 - 5005 - 9394 - 5

I. 民… II. 周… III. 非国有经济 - 银行 - 研究 - 中国 -
1912—1937 IV. 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909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 //www. cfeph. cn](http://www.cfeph.cn)

E - 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2.25 印张 289 000 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涿州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170.00 元

ISBN 7 - 5005 - 9394 - 5 / F · 815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周春英，女，1973年1月出生，山东省菏泽市人，中共党员，现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2005年6月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经济史、中国财政制度变迁和财政思想史等。迄今已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参与教材《中国财政史》的编写工作。

责任编辑 / 周桂元

封面设计 / 颜 黎

编辑委员会名单

编辑委员会主任 杨灿明

副主任 陈志勇 庞凤喜 郑宁军

委 员	王金秀	叶 青	许建国	刘京焕
	李大明	杨灿明	陈光焱	陈志勇
	吴俊培	郑宁军	庞凤喜	侯石安

论知识的专业化与一体化（代序）

——对“宽口径，厚基础”人才培养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灿明

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非常强调专业化分工，认为分工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他拿生产“大头针”为例子，详细讲解了生产的每一道工序。通过将生产大头针的工序进行分解，每一名工人只要专心负责好自己专职的工序，通过每道工序中各个工人的配合，最后生产出的大头针数量要远远多于这些工人单独进行生产的大头针数量的总和。究其原因就在于每一个人专职进行某一个工序的劳动可以大大提高该工序的劳动生产率。再通过各道工序的配合，该工作的整体效率就会得到极大提高。因此，通过分工协作生产，产品的生产将更有效率，更能提高生产能力。斯密也据此认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分工将越来越细，这有他一定的道理，并部分地被社会经济的实践所证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市场交易越来越频繁的同时，一体化（主要指纵向一体化，即用企业组织替代价格机制）的趋势也形影相随，导致专业化和一体化两条线索并

存。为什么会这样呢？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做了最好的说明，他运用交易成本的比较来解释专业化与一体化相互替代的论点，解开了令人不解的“斯密之谜”。他指出，由于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建立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存在的原因就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他进一步指出，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相应地，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是通过订立长期合同实行市场交易，还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两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

人的知识结构也是如此，一个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也不可能兴趣、环境、经历都一样，因而学习会有侧重，知识结构会有区别。并且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也会要求人们知识的专业化分工与之相适应。但仅仅强调分工，强调专业化，强调每个人只在某一具体的方面倾其毕生精力，也是非常有害的。生产上的过度专业化使工人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性的工具，学习上的过度专业化使学者接受的永远是单一而相同的“食谱”，是极不合理的营养结构，这都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强调分工，还要强调协作，强调专业化，还要看到一体化。清代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虽然他说的主要是读书和行路要兼顾或者说理论与实践要结合的道理，但就“读万卷书”而言，显然也强调了知识的面要广博。在他那个时候，出版业并不发达，一是制度上不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者说不允许出版自由（甚至还搞文字狱），二是技术上也远比现在落后，出版的周期很慢。此外，由于闭关锁国，不搞对外开放，不搞国际交流，引进洋书也非常有限。总之，他那个

时候的书市并不发达，书籍比现在不知要少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强调读万卷书，无异于要把找得到的书几乎读它个遍。如果换到现在，他的要求肯定远远不止一万卷了。过去的大思想家，有谁能准确地说出他是什么专业呢？如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就说亚当·斯密，都知道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他的第一部著作并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而是《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是后来才写的。再说马克思，他的学问至少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我们还可以问，自上世纪“二战”以后出现过哪些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不妨问问，老子的《道德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人说是政治书，讲的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如“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以及其中所宣扬的愚民思想；有人说是军事书，是兵书，讲的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出奇不意、攻其不备等军事道理；有人说是修身养性的书，是体育健身的书，因而成为道家炼丹、隐士养身、气功师练气的指南。比如“恍兮忽兮、恍兮忽兮”的说法；更多的人说是哲学书，讲的是祸福相当、物极必反、阴阳互补、矛盾转化等辩证道理，因而老子被推崇为朴素辩证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些观点比许多西方哲学家不知早了多少年。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学问家，一定要强调知识结构的优化，强调基础知识的深化，把专业化与一体化结合起来。狭窄的知识积累，必然导致狭隘的思维方式，必然使研究工作受到局限，必然得出片面的结论。任何问题都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因而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学问都是相通的，真正的专家并不是狭义的专家，而是博中有专，以博养专。

搞经济学的人遇到有些社会问题时说，这个问题我不懂，问社会学家吧；搞社会学的人遇到较简单的法律问题时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问法学家吧；搞法学的人遇到常识性的经济问题时说，这不是我的专业，问经济学家吧。更为严重的是，搞税收的人遇到预算问题时说，这个我不清楚，问预算老师吧，搞预算的人遇到税收问题时说，这不是我的专长，问税收老师吧，如此等等，若属于太专业的问题，还无可厚非，但若属于常识性的原理问题，就不好了。如果学问都是这样做下去，那么一个具有有机联系的世界不是都会被人人为地割裂吗？还出得了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吗？所谓学者，也就顶多是一个学匠罢了。这就像中国古代的庖丁，他那解牛的本事无人可比，堪称世界第一，可庖丁本事再大，也只是一个宰牛匠，而不是一个大动物学家。

在许多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里，对专业是看得很淡的，是真正的“宽口径，厚基础”。到了硕士研究生才比较强调专业，而且也远没有我们的专业划分那么细（像本人所从事的财政学专业，在许多西方国家的专业目录中就不存在，自然就更谈不上税收专业了）。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孔子提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几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七艺”，即辩论术、修辞学、文法、几何、天文学、声学、算术。其实“六艺”也好，“七艺”也好，都是强调文理兼修，强调多才多艺。

上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调世界的物质性，把一个有机的世界比做一架机器，每个学者专门攻一个零配件，既不重视对机器的整体认识，更忘记了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人不仅仅是物的，还是精神的，或者说人更应该是精神的。

一个人把本来应该由自己去了解的一些东西交给了别人，自

己只是被动地去利用这个人的研究成果，而这个人同样也把应由自己了解的一些东西交给别人，他也只是被动地去利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依此类推，整个研究工作就充满了被动性、机械性、僵化性和局限性，自己应具备的一些知识委托给了另外的人，自己的一些功能被别人的功能所替代，久而久之，人的思维能力、综合能力、想象力、创新力能不下降吗？人的思想的潜能能不退化吗？这里也有一个委托代理的问题，也存在一个成本收益或者说交易费用的比较问题。委托代理是人类社会经济中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大到选民选议员、选总统，小到家里请保姆、请钟点工。只有代理收益超过代理成本时，实行委托代理才是合算的，否则就得不偿失。

人的身上有许多器官，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如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鼻子可以闻，脚可以走路，手可以拿东西，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器官的功能逐步被一些外在于人体的物质器械所替代，如车船代替行走，望远镜代替望远，助听器代替听力，麦克风代替吼叫，小推车代替手提，等等。久而久之，人的器官本来所应有的功能就退化了，如听力差了，视力弱了，嗓门小了，腿不能行远路了，手不能提重物了，等等，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和弊，也可以进一步引伸为专业化的利和弊。值得指出的是，人的许多器官可以被替代，而且替代之后可能利大于弊，比如旅行，现在乘飞机一天就可以到大洋彼岸，而古时候人们靠两条腿进京赶考，没有一年半载是不行的。但是，迄今为止的科学研究还不能证明人的思维活动也能被机器所替代，将来恐怕永远也无法证明。这样一种无法找到替代物的功能的衰退，无疑会是整个人类自身的衰退。

本人是从事财政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我认为，研究财政学

的人，不但要有扎实的应用经济学的知识，还要有扎实的理论经济学的知识；不但要有经济学的知识，还要有政治学、法学（特别是宪法）、管理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不但要有较好的逻辑学、中外文学等方面的基础，也要有相关的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即便研究某一具体问题，也需要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较广博的知识积累。比如研究财产税这么一个小小的税种，就需要产权经济理论、法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管理学、心理学、数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支撑。

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要有相应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同样，搞自然科学的人，也要有比较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结构。一个真正的大自然科学家，一定会有较好的人文基础。当年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历史和语文都是100分，物理只有5分，英文是0分，按理他应该读历史系或中文系，但正巧这时“9.18”事件爆发，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原因之一是没有飞机、大炮、坦克，抵抗不过，于是钱伟长发誓要学物理学，要生产自己的飞机、坦克，后来顺利毕业并留学美国，最后回国效力，成为大物理学家。没有强烈的爱国心（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没有很扎实的人文功底，他能否成为大物理学家是值得怀疑的。他90多岁的高龄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言谈举止、逻辑思维、渊博学识，更像造诣高深的人文社会学者。

无独有偶，近些年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似乎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有点像“杂家”，如搞政治学的、法学的、数学的、心理学的，等等。

我要得出的简单的结论是：学知识、搞研究，也要兼顾专业化和一体化，重视分工与协作；知识的专业化和一体化相互替代的边界之确定，也是一个交易费用的比较问题，只不过其内涵和

比较过程更为复杂；不但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更要重视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各门知识之间的协作，后者更能开启人类的思维与想象潜能，更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更能促成向真理的逼近。而这，就要求一个人具备较渊博的学识和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也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往往是大器晚成的。

序

2002年9月，周春英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博士学位。2005年6月，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工作。现在，财政税务学院决定将其博士学位论文纳入博士文丛出版，是值得庆贺的。

周春英博士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是1912—1937年间中国民营银行运行机制问题，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核心和杠杆作用，近代中国出现的公司组织形式的银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于1897年，在此后短短四五十年间，全国先后有数百家银行成立。中国银行在近代的发展道路和命运，与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所在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息息相关。

对于中国银行，我国学术界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较多的研究，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千家驹、贾士毅、吴承禧、马寅初等，对我国银行与财政、公债的研究，均做出过突出的贡献。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加入WTO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学术界对银行史的研究也更加重视起来。总的说来，学术界以往对银行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对银行发展史的总体研究，或对中国、中央、交通等

国家银行和金城、上海商业储蓄等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将民营银行作为一个整体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资本构成及运用、经营环境变化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周春英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进一步修改补充后，有如下特色：

首先，论著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她利用南京及南京大学有利的条件，深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到上海市档案馆，挖掘了大量未刊的原始档案，诸如北京政府档案、南京国民政府档案、财政部档案、各银行档案、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的金融法规等；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民国时期各有关部门编印刊行的银行史料、公债史料以及各种已刊和未刊的书报文稿、前人论著、报刊杂志及不同时期的银行年鉴、财政年鉴等，从而使研究工作建立在丰富而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避免了无根据的臆断，使研究结论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其次，作者注意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使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往往是互相渗透交叉的，一个学术问题往往牵涉到几个学科，单纯的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全面、精确地阐明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超越历史学单一的学科范围，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察，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历史全貌、演变规律及各种政治经济关系。民国前期民营银行的运行机制研究，既是金融银行学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又属于中华民国史领域的史学问题，并且也是制度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单纯地运用历史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很难进行透彻地研究的。作者刻苦认真地钻研了有关金融学、经济学、财政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

上，运用财政学、金融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1912—1937年间中国民营银行的发展过程、制度运作、业务运行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等作了深入剖析，无疑在前人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再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使这部论著具有较明显的创新性。

再次，论著以主要的篇幅，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民国前期民营银行与社会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论著从一个新的视角，肯定了民营银行在促进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支持工商业发展、维持政府财政运行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学理上、宏观与微观上做出了符合实际的历史评价，使我们从近代民营银行的制度建设和发展道路中汲取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银行制度建设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周春英为撰写这部论著，下了很大的功夫，挖掘、搜集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在一篇论著中同时运用如此之多的原始资料是不多见的，其做学问的态度是严谨的。但是，作为历史学者研究经济学的问题，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差错不足亦在所难免，还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史全生

2006年8月20日于南京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民营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28)
第一节 民营银行产生的历史条件	(28)
第二节 民营银行的发展	(49)
第二章 国家对民营银行的制度安排	(67)
第一节 民营银行产权制度的变革	(67)
第二节 民营银行与政府的金融监管体制	(79)
第三节 民营银行与国家统一的银行立法	(92)
第三章 民营银行同业组织的自律与自建制度	(116)
第一节 银行公会的自我管理 with 制度创新	(117)
第二节 银行公会的风险防范机制	(148)
第四章 民营银行个体的内部控制制度	(165)
第一节 民营银行的组织结构	(165)
第二节 民营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	(178)
第五章 民营银行的资金来源	(207)